

破“心中贼” 驱“心中魔”

□ 湖北日报评论员 艾丹

日前,经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财政部纪检监察组、黑龙江省监察委员会对财政部农业农村司原司长吴奇修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通报称,吴奇修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十九大甚至党的二十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不知止,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

这是极具警示意义的一纸通报。吴奇修曾被称为北京大学历史上第一位“大学生村官”。上世纪八十年代,吴奇修从北京大学经

济系毕业,放弃留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主动申请下基层,到省级贫困县涟源县工作。回看吴奇修的工作履历,他曾带领贫困村脱贫致富,曾在多个重要部门和岗位任职,拥有“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等诸多荣誉。可是,最终却因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沦为反面典型。

党纪国法就是高压线,任何人都不能触碰。新时代以来,正风肃纪持续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纪律面前没有例外,法律面前没有特殊,一些腐败分子不管位高权重,不管藏得多深,终究逃不过法纪的惩治。曾经高光的履历、鲜亮的业绩,并不是“金钟罩”或“免死金牌”,更不存在“功过相抵”之说。落马官员中,不少人曾经都是能力出众、政绩斐然的佼佼者,却

在权力与诱惑的旋涡中逐渐迷失方向,从“明日之星”沦为“阶下囚”。这样的反差,值得党员干部警醒。

古人说:“天下之难持者莫如心,天下之易染者莫如欲。”行为失范、廉洁失守,往往是从思想意志动摇开始。有的人能经受住基层的艰苦考验,却在晋升高位后自我膨胀;有的人在“清水衙门”时两袖清风,却在“资源咖”的位置上经不住利益诱惑;还有的人“当官”目的性太强,一旦组织任用达不到自我预期,就将松懈、不满情绪演变成四风问题……看似是环境变了、位置变了、机遇变了,实则是心变了。

从基层墩苗、实践锤炼,到培养提升、委以重任,一个优秀干部的成长是不容易的。为何一些人从最初心怀理想,走着走着却走向

了人民的对立面?世界上最大的敌人,是自己。破除“心中贼”,驱散“心中魔”,筑牢“心中堤”,守牢自己的本心、初心是关键。这颗心,应是心忧民生的公仆之心,是为民谋利的清正之心,是无私忘我的赤诚之心。时刻不忘自己为什么而出发,时刻对照有没有偏离初心,才能始终走在光明的大道上。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必须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决把党的自我革命要求落实到位,推进党的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定不移开展反腐败斗争,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提供坚强保证。进一步筑牢思想防线、扎紧制度笼子,让阳光成为最好的防腐剂,让心贼无处遁形,心魔无处生根。

□ 湖北日报评论员 张双双

近日,有网友反映云南省彝良县小草坝镇三道村一山沟内垃圾成堆。目前,垃圾已全部清离现场并进行无害化处理,下一步会种植草木进行生态修复。

垃圾堆被清走了,但农村垃圾处理难题依然存在。当地政府介绍,因为镇村垃圾处理设施和能力不足,没有建立规范的收集、转运及处理体系,长久以来,当地都处在一个垃圾无序倾倒的困境之中。经网络曝光后,当地政府才意识到,要加快构建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在三道村等偏远村组合理增设垃圾收集容器和临时中转点。

从“溶洞内垃圾堆积十层楼高”到“露天垃圾场严重污染周边环境”,频频被曝光的农村垃圾堆放事件,暴露出当下农村垃圾处理的短板。受地理条件与经济基础限制,农村边远地区垃圾处理成本居高不下,地方财政亦承受着沉重负担,乡镇自身的垃圾处置能力更是难以满足实际需求。在一些农村,生活垃圾依然存在“收不及时、运不出去、无处处理”的难题。网络曝光一处,地方清理一处,这种解决单个问题的做法,治标不治本,终会“按下葫芦浮起瓢”。

从清理一个村子的垃圾堆,到补齐农村垃圾处理短板,需要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延伸。现实中,有很多问题其实是彼此关联、相通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在解难题时更进一步,从具体问题中发现普遍规律,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农村垃圾处理问题,涉及财政投入、设施建设、群众生活习惯等多重原因,背后还关联着公共资源配置不均衡、基层治理能力不足等深层次矛盾。只有树立系统思维,从盯着“某个点”到处理“整个面”,从疏通“某个环节”到打通“整个链条”,才能跳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窠臼,以个性问题的解决带动共性问题的解决。

办好“一类事”,不仅需要対问题追根溯源的本领,更需要推动解决根本问题的魄力和水平。只有坚持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拿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真心、热心和耐心,增强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长效机制,推动“一类问题”解决的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当前,以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推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需要挖掘地方性生态知识和生产生活智慧,结合现代治理理念,在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的多元共治中寻求突破。

从解决“一件事”到办好“一类事”,是对解题思路、举措、方法、机制的综合考验。直面考验,在办好“一类事”中拓宽视野、开阔思路、创新方法、提升能力,才能把难题堵点高质量解决好。

一根甘蔗何以撬动情绪经济

□ 湖北日报评论员 杜宇慧

四川眉山“偷甘蔗”火了,许多游客即使过了晚上12点,也要到甘蔗地里打卡。

所谓“偷甘蔗”只是游戏,其实收费9.9元一根,味道也不比超市里更甜,游客究竟图什么?答案很简单:快乐。约上三五好友,“偷”得一两根甘蔗,还要机警躲避“看守”,仿佛回到“胡作非为”的童年。这种通过小小“越轨”寻求的乐趣,鲁迅先生在《社戏》中早有描摹:一群孩童瞧完社戏后,趁夜“偷”摘一大捧罗汉豆,豆子本身寻常,但那份紧张、兴奋和同伴情谊,却让作者感叹:“一直到现在,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

一捧豆子、一根甘蔗,简单的田间游戏,有时比精心打造的景点更有吸引力。“偷甘蔗”“挖土豆”“捡秋”等体验的走红,共性在于以最原始、本真的方式,提供了都市生活中稀缺的鲜活感,让人们暂时抛开成人世界的规则,做一回孩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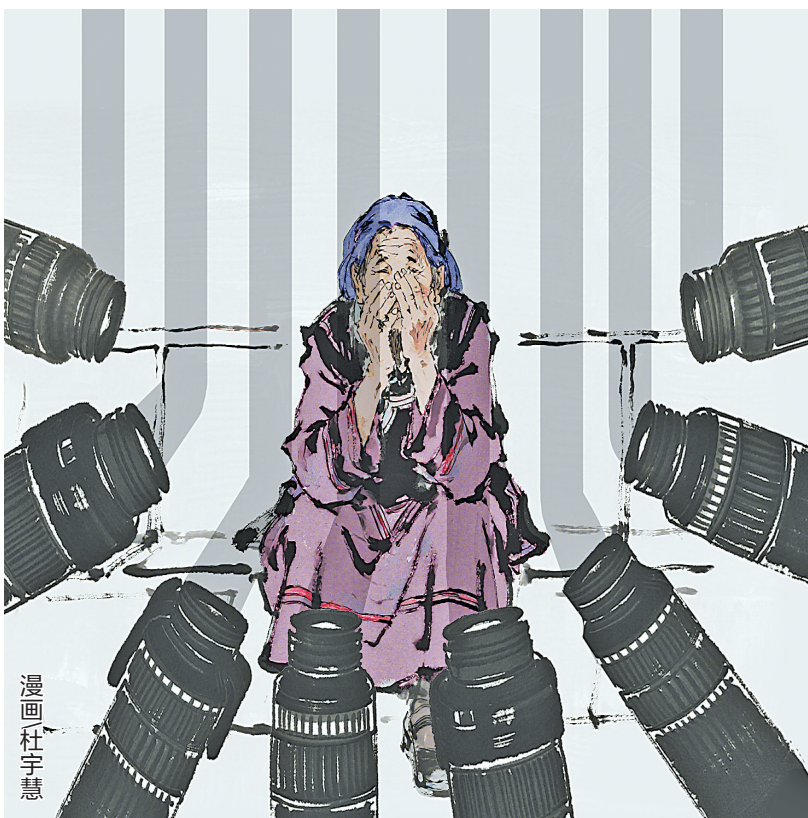
“偷甘蔗”的火爆,可以为农

文旅发展带来一些启发。农耕文化有其生动之处,泥土味也能打动人心。当游客手持甘蔗,在田埂间奔跑躲藏时,游客收获到情怀与满足,农民得到增收渠道。这个法子可谓一个“金点子”,给了游客上台“当主角”“唱一出”的机会,当游客放手做些事、付出些劳动时,便与这片土地产生了更深层的联结。

2024年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中,提出“坚持农文旅融合的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关键在于做实“融”字文章。以农事促旅游,以旅游促产业,形成良好发展格局。例如,甘肃省高台县南华镇的“认养葡萄树送鸡”模式,创造了双重消费体验,有效促进增收;“偷甘蔗”项目当地文旅局,也借势推出景区优惠、住宿折扣。从“偷甘蔗”这类核心体验出发,衍生出“吃、住、行、购、娱”更丰富的产业链条,“情绪价值”就可转化为“经济价值”。

时事绘

“镜头霸凌”当喊停



漫画 杜宇慧

近日,有网友发帖称,在凉山公益列车上,众多游客围堵拍摄一名彝族阿婆。即使老人明显表现出不适与抗拒,拍摄者依然没有放下相机。这无疑是一种粗暴的“镜头霸凌”。

观光拍摄本为记录美好,但不能侵犯他人尊严和隐私。真正的记录,应建立在尊重和共情上,而非将他人当作满足猎奇心的道具,更不该让公益列车沦为猎奇场所。面对极不文明的镜头围堵,列车运营方有责任及时提醒与干预,这既是对乘客基本权益的保护,也是维护公共场所秩序、践行人文关怀的应有之义。

(文/张双双)

百份珍贵档案再现湖北人徐会之报国往事

吴石被捕后,徐会之临危受命深入台湾,一年后血洒马场町

湖北日报全媒体记者 金凌云 李娅晶
通讯员 张益游

电视剧《沉默的荣耀》再现了中共隐蔽战线战士吴石等人在台湾的生死斗争,撼人心魄、感人至深。

70多年前,吴石等人被捕后,为了祖国统一大业,湖北人徐会之临危受命前往台湾,一年后血洒马场町。11月18日是徐会之烈士的忌日。连日来,湖北日报全媒体记者多方走访,试图再现徐会之舍生忘死的感人事迹。

国民党中将舍家赴龙潭

11月18日上午,武汉市烈士纪念馆九峰山园区,苍柏青翠间,一尊烈士铜像巍然挺立。这位烈士是74年前牺牲在台湾的湖北人徐会之。

徐会之是谁?为何会牺牲在台湾?团风县徐会之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童吉怀向记者讲述了发生在70多年前的那段往事——

1950年初,“吴石情报组”身份相继暴露,台湾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情报网遭受重创。

1950年3月,重庆解放不久,49岁的徐会之接到党组织一项重要隐蔽任务,以对外公开的“总统府中将参军”的身份前往台湾开展策反和情报收集。

根据安排,徐会之要秘密进入台湾,利用自己曾经在国民党内部的较高地位和重要关系获取政治、军事情报,策反国民党高层。

但此时岛内白色恐怖日益笼罩,台当局已加大对台内人员的甄别。

明知此去是龙潭虎穴,徐会之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告别夫人和一双年幼的儿女,毅然接受组织的安排。

徐会之经香港抵达台湾。不幸的是,进入台湾不久他便暴露,被国民党高雄“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逮捕。

1951年,台当局本以“预备颠覆政府”判有期徒刑,但11月13日当徐会之案的公文送到蒋介石手中时,蒋签下了“立即枪决可也”。

11月18日凌晨,徐会之在台北马场町被



徐会之

秘密杀害,英勇就义,年仅50岁。

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徐会之舍生取义,以生命践行了他在黄埔一期入学登记表上写下的铮铮誓言:“抱牺牲主义,为人类造幸福,素志未酬,我心耿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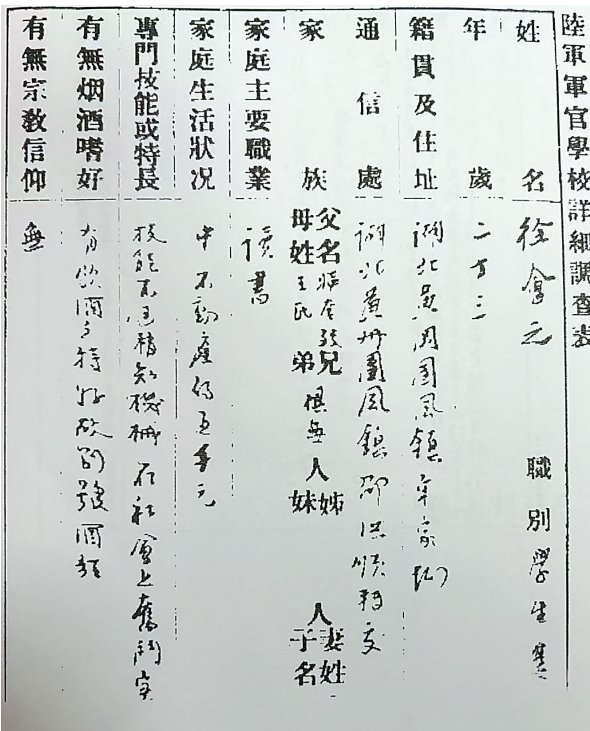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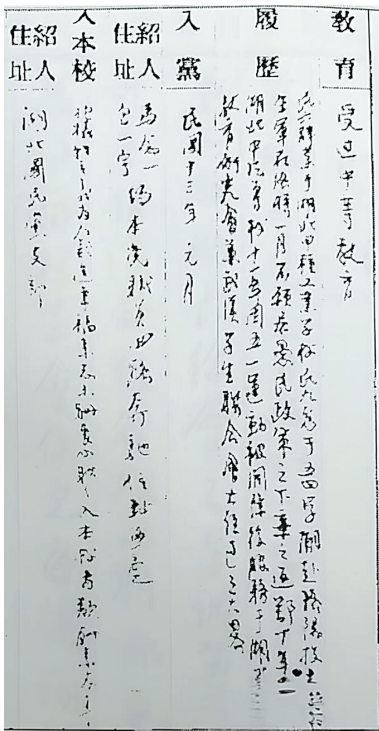
抗战期间曾与吴石共事

湖北省档案馆现存数百份徐会之的档案。从这些泛黄的珍贵档案中,徐会之烈士胸怀大志、报国利民的初心可窥一斑——

1901年,徐会之出生于黄冈市团风县宋家坳村一个书香门第,其父徐映奎曾留学日本加入兴中会(同盟会前身)积极投身革命。

徐会之深受父亲的影响,早早便接受了新思想、新文化。1924年,徐会之考入黄埔军校一期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任黄埔军校教导团连队党代表。

档案资料显示,他先后参与北伐战争、抗日战争。1940年初,徐会之调任桂林行营政治部副主任,并参加了昆仑关会战,随后升任第四战区政治部主任。



徐会之入学登记表(本文图片均由湖北省档案馆提供)

在此期间,他与吴石将军曾有短暂的共事。二人在1940年昆仑关会战期间均隶属于第四战区,共同参与了该战役的军事或政治工作。

抗战胜利后,徐会之任汉口市市长,致力于城市恢复与治理,在任汉口市长的过程中,徐会之通过党组织地下联络员为革命根据地联系到了大批医药物资,帮助地下党组织开展工作。

1949年初,徐会之任“总统府中将参军”,12月在重庆迎接解放。

“为了保护组织,减少影响,徐会之的身份一直被隐藏。”省档案馆档案开发利用处相关负责人介绍,直到1985年被评为烈士,徐会之的事迹才逐渐为人所知晓,“他的一生就是报国利民的一生。”

徐会之牺牲后的几十年里,家属几经辗转在台湾找到他的安葬地。1996年,徐会之

的骨灰从台湾迎回,被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2016年11月18日分迁至团风县徐会之故居。

2011年,武汉市烈士纪念馆九峰山园区,为徐会之立起纪念铜像。“他和吴石将军一样,都是在黎明前倒下的孤胆英雄,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园区工作人员王盛勇说。

徐会之留下的一枚指北针,女儿珍藏了70多年

在徐会之的故乡,乡亲们从未忘记过这位英雄。

11月17日清晨,团风县总路咀镇宋家坳村徐会之故居,庭院草木葱郁,乡亲们和徐会之研究会工作人员静静伫立,缅怀徐会之。

“2005年,团风县人民政府曾对徐会之故居进行修缮。”童吉怀曾是徐会之故居管理人

员,研究徐会之多年。

徐会之去台湾后的第二年,妻子刘先知带着一双儿女从重庆回到武汉生活。

刘先知去世前曾多次回到故居,童吉怀多次参与接待。他清楚地记得,2011年4月20日在故居里,刘先知当面回忆起徐会之离开时说过的话。

“他说他要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我问他什么时候能回来,他说胜利的那一天就是我们见面那一天。”

“也许是你为我带着家乡的黄土、带着祖国的鲜花,放在我的墓前的那一天。”丈夫的话深深刻在了刘先知的脑海里。

“父亲离开的时候我们都很小。”徐会之的女儿刘莉今年78岁,父亲离开时她才不到4岁。

“这是我心里永远的痛。”采访中,刘莉告诉记者。

当时小小的她尚不能理解为什么父亲会离开,明明战争的硝烟已经远去,好日子就要来了。

长大后,她理解了。刘莉把对父亲的思念深埋在心里。在她手中,有一枚珍贵的指北针,这是父亲留给她的唯一遗物。

“每年清明节,徐会之的后人都会回来祭奠缅怀他。”多年来,童吉怀与徐会之的后人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这些年里,徐会之的子女们行事低调,默默传承着父亲的精神。

在徐会之故居门前,有一条小河,日复一日地流向巴河、注入长江,川流不息、润泽两岸。

档案解密

(第151期)



湖北日报
档案解密
合办